

刍议国外大学通识教育经验的中国化运用

徐宁

(南京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二十多年来我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实践历程都是基于对国外大学的经验借鉴而开展的。然而,却没能形成令人满意的通识教育模式。文章通过对我国学习国外通识教育经验中存在问题的梳理,指出了我们应当坚持的核心理念。同时,进一步提出坚持核心价值观、注重培养创新精神以及明确通识教育制度化安排的三个实施重点。

关键词:通识教育 本土化 核心价值观 创新精神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9-0120-04

如果从1995年教育部在若干高校试点文化素质教育算起,我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与建设已历20年。20年来,我们对通识教育改革与建设的期待不可谓不高,投入不可谓不大,但迄今为止我们似乎仍然处于改革与建设的初级阶段,人民满意、教师支持、学生认可的通识教育模式千呼万唤仍不出来。近年来,高教界同行对此已有所反思,但往往偏重于对客观的体制性因素的检讨,几乎没有触及对改革与建设主体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尽管我国古代也有通识教育传统,但我国大学当前开展的通识教育改革与建设无疑都是以国外大学特别是美国大学的成功经验为范本的。国外大学的先进经验我们当然要学习、借鉴,不过我们的学习、借鉴必须得法,否则我们就会在邯郸学步中迷失自我。因此,在反思通识教育改革与建设当前的困境时,检讨我们对待国外大学通识教育经验的方式方法是否正确,是一项必须认真对待的工作。

一、我国借鉴国外通识教育经验中存在的三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以及社会发展需要的变化,我国大学从1952年以后奉行的专业教育模式的内在局限性开始暴露,并在1992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迅速激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施行通识教育的国外大学特别是美国大学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牢固确立了自己在世界大学体系中的领先地位。因此,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个别一流研究型大学率先开始重新引入国外大学主要是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开展通识教育改革与建设。必须承认,我们当年在对待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时,存在一定程度的教条主义问题,把美国经验、模式奉为圭臬,不从或较少从本国实际、本校实际出发,盲目引进,结果使得“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美国的成功经验在我国并没有结出预期的甜美果实。

具体地看,我国在学习国外通识教育经验过程中所犯的教条主义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形而上学倾向。在国内,我们一提到通识教育,绝大多数人立刻会想到美国,进而想到哈佛、耶鲁等美国的世界一流

收稿日期:2015-04-07

基金项目:“大规模在线课程(慕课)与哲学通识教育的转型与升级研究”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立项课题(2015JSJG168)

作者简介:徐宁,南京大学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南京大学EMBA教育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理论、企业家教育。

研究型大学。这些美国大学事实上已经成为我们思索和践行通识教育的“标杆”。应当讲,这种言必称美国大学的想法和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一,近150年来,现代通识教育的发展是与美国大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哈佛、耶鲁更是几乎在通识教育的每一个重要发展阶段都留下了自己的深刻烙印;第二,二战以后,哈佛、耶鲁等美国研究型大学迅速崛起,牢固确立了它们在世界大学体系中的领导地位,于是,人们合乎逻辑地在它们的成功与它们施行的通识教育之间建立了某种因果关系,从而使它们的通识教育模式具有了某种不证自明的优越性;第三,近半个世纪以来,港澳台一些华语大学先后效法哈佛、耶鲁的通识教育模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只要向前走一步,哪怕是很小的一步,真理也会变成谬误。这些年来,我们往往会采用以下形而上学的方式来“神化”哈佛、耶鲁经验:第一,把它们视为超越历史的“先天”之物,没有充分自觉到它们都是长期艰难探索和不断妥协调整的结果,并且依旧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第二,把它们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没有深刻意识到它们都是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产物,并且是与特定的教育传统和制度环境相联系的;第三,把它们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没有清醒认识到它们都是针对具体的教育问题设计出来的改革方案,不可能无差别地解决所有教育问题。

其次是形式主义倾向。通识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任何成熟的、可持续发展的通识教育模式都包含以下要素:第一是通识教育理念,作为大学的整体教育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识教育理念必须与教育理念的其他部分,如大学观、人才观、课程观等相互匹配,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通识教育在既有的大学教育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第二是通识课程体系,一般说来,通识教育理念决定通识课程体系的设计原则,进而决定通识课程体系的实现形态;第三是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这是通识教育能够有效运转并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证。就通识教育模式的建构而言,理念的凝练、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的打造属于“练内功”,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成效难以迅速显现,课程体系的搭建则是“练外功”,不仅上手快,而且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历史地看,不管是哈佛、耶鲁,还是其他通识教育卓有成效的国外大学,都注重“练内功”,因为“内功”练好了,“外功”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然而,这些年来,在名利思想和懒惰作风的影响下,我们往往是以形式主义的方式来对待哈佛、耶鲁经验,热衷于搞面子工程,建设了许多貌似通识课程的“伪通识课程”,不仅浪费了宝贵的资源,而且影响了通识教育的声誉。

最后是非意识形态化倾向。通识教育又称“全人”教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对“全人”的理解是不同的。不管选择哪种通识教育模式,美国的大学归根到底要培养的都是符合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全人”,但它们却标榜或自认为这种“全人”理想是永恒的、普世的。但令人忧虑的是,国内一些高教工作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非意识形态化倾向的影响,没有察觉到潜藏在美国通识教育模式中的这种意识形态性,或一厢情愿地认为可以通过直接引进某种美国模式而培养出中国需要的“全人”,或干脆就认为我们应当培养的就是这种符合美国理想的“全人”!^[1]试问,如果不能培养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全人”,我们的通识教育怎么可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呢?

二、学习国外通识教育需坚持的三个核心理念

经过20多年的思考与探索,国内高校已对实施通识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达成了共识,并积累相当丰富的改革经验。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在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教育方针指引下,不断地融入先进的办学理念,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了一条新的发展之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就通识教育而言,经过那么长时间的摸索,其在观念中的重要意义和实践中的真实地位、实施效果仍有较大的落差,这与上文所述我国通识教育对国外经验学习、运用的方法与策略所存在的问题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应如何正确地借鉴通识教育的外国经验呢?2014年5月4日,在与北京大学师生的座谈中,习近平同志就如何正确对待国外大学的先进经验作出了精辟论述,指出:“党中央作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决策,我们要朝着这个目标坚定不移前进。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2]这实际上也为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国外大学的通识教育经验指明了方向。

第一,应坚持以本土化为立足点。国外通识教育经验本土化就是将西方关于通识教育好的做法和模式与中国通识教育现状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通识教育在中国大学相互汲取精华的过程。在世界多元文化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现阶段处于弱势地位,由于通识教育具有强烈的文化性格,因此将国外的通识教育经验借鉴并进行本土化,实际上就是吸收优秀民族文化的精华并用之于培养“人”的过程,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较大意义。目前,我国大学通识教育本土化已经有了一定进展,如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南京大学的“三三制”改革,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的来说,还存在着内容上、形式上以及师资与教材等方面的不足。因此,在学习和借鉴国外通识教育经验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该秉持本土化理念来进行。国外通识教育的本土化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客观地分析国外大学通识教育经验所处的特定外部环境,成功的通识教育模式必定来源于并准确契合现实的需要;二是在将国外大学的通识教育经验运用于我国时,始终以本土化为原则。从这两个层面的关系来看,对国外大学通识教育建设与改革过程中本土化特征的研究,将更好地指导我们以合理的方式借鉴、运用国外经验。

第二,应坚持本校化。本校化是本土化原则在执行层面延伸的必然结果。虽然通识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可以取得相对共性的认识,但是在具体落实方面,却受制于不同高校的学校传统、院系设置、课程结构、师资与学生群体特征等因素,不能采用千篇一律的模式,而应根据各校不同情况,进行个性化的规划与实施。在已有的实践方面,南京大学的“三三制”改革是通识教育本校化理念的典型代表。南京大学秉持着培养什么人和如何培养人这一终极目标,充分考虑到本校的综合性学科优势以及研究型大学特征,开始了本科通识教育教学改革。具体的措施上,针对学校高水平研究型教师多的特点,南京大学建设了近200门由院士、长江特聘教授、杰青、国家教学名师等高水平教授主持的新生研讨课,还建设了100余门高水平通识教育课和高年级研讨课,从新生入门到学会融会贯通和解决问题,从提出问题到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为本科生培养全面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培养高尚的道德素养、宽厚的知识面和敏锐的思维与判断力,进行了较好的本校化探索。南京大学的“三三制”改革还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第三,应坚持与时俱进。根据所处时代的特定需要对通识教育目标与实施模式进行不断地调整,这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践行“本土化”原则的必然要求,“本土化”不仅应体现对社会传统文明、价值的继承,更应体现对当代特征与社会需求的呼应。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和急剧转型时期,各种新技术日新月异,新的社会思潮不断涌现,通识教育的发展必须与时俱进。比如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急速膨胀,但传统文化素质的提升相对滞后,这就形成了两者之间一定的矛盾,因此通识教育就应该更加偏重对学生人文素养和品格情操的培养,而那些相对较为功利性、知识性的培养模式就不能占太主要的地位。

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本身就很好地坚持了本土化、本校化和与时俱进的理念。19世纪中期开始,工业化和近代化浪潮使得17世纪自英国引入的“自由教育”理念和课程不再能满足社会变化的需要,对于专业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大,各种自然科学、实用科学课程大受学生欢迎。然而,物极必反,过度集中于某一学科领域,导致知识面单一,视野狭窄,且难以形成共同的文化。在这种环境下,“通识教育”逐步发端,其教育理念融合了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的长处,注重启发心智的同时,也不排斥实用性课程。因此,美国的通识教育可以说是“自由教育”本土化以后的产物。同时,美国历次通识教育的改革,也都体现了时代特征的烙印。第一次通识教育运动与一战带来的创伤息息相关,战争强大的破坏性动摇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基础,领袖们相信通过振兴通识教育,能够解释并缓解当时社会面临的问题。这一时期,赫钦斯推动的芝加哥大学课程计划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赫钦斯的通识教育继承了自由教育注重理性与德行培养及崇尚名著阅读的传统,同时他敏锐地察觉到工业发展带来的功利主义泛滥的不良后果,反对过分专业化。20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的通识教育再次掀起高潮。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引发西方文明的危机感,这是美国再次推动通识教育改革的深刻动因。这一阶段,柯南特成立的哈佛大学专门委员会在1945年发表的《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影响深远,其中,将通识教育定义为“首先将学生教育成民主社会中负责任的人和公民的那一种教育”,将通识教育提升到打造“美国文化熔炉”的高度。第三次通识教育改革始于20世纪70年代,此前,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给美国带来很大震撼,数学、科学和外国语言的学习更加受重视,由于70年代经济不景气,学生就业困难,很多学生从文科转向职业教育,通识教育遭到极大的破坏。在这种背景下,哈佛大学再次发动了通识教育改革,制定了著名的“核心课程计划”,2007年,哈佛大学发布了《通识教育工作组报告》。以此来看,从自由教育到通识教

育的历次改革,最核心的变化是通识教育培养目标的逐步调整,而这种调整正是基于不同时期的美国社会的需求,而社会的不断发展,通识教育的改革、调整仍将不断延续。^[3]

三、当前我国借鉴国外通识教育经验需关注的三个重点

“本土化”、“本校化”、“与时俱进”内在的共同的核心理念是“实事求是”,从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特征与需求出发,结合我国高校的实际,重点要在以下几方面强化经验学习并明确本土化运用策略。

一是注重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美国的通识教育中,始终将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自由等传统社会价值的继承作为重要方面。习近平同志在与北京大学师生进行座谈时的讲话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基于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征与需要,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体现了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要求。我国通识教育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需将上述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渗透作为重要使命。

二是注重创新精神的培养。党中央上个世纪末就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4]江泽民同志在1995年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我们成为了一个经济大国,但非经济强国,经济强国的重要衡量标准是看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企业家数量的多少,这两点都需要大量的创新性精英人才作为支撑。由此可见,创新人才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十分重要的,这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期繁荣富强、中华民族能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通识教育的核心灵魂,就是人才创新精神的培养和锻造。鉴于此,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应当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为核心任务和重点目标。只有紧紧围绕这一核心目标,才能使得我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肩负应有的历史责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是明确通识教育的制度化安排。目前,我国高校通识教育在具体实施方面存在的各种缺陷,与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有很大关系。通识教育的制度建设,应覆盖前期规划、中期课程与师资的遴选与考核、后期的日常管理全过程。而落实这些环境的制度安排,需要建立一个、推动通识教育实施的专门机构。以哈佛大学为例,该校根据2007年通过的通识教育文件,成立了通识教育常务委员会,这是一个独立机构,负责审阅通识教育课程的大类设定和其他必要方面,并帮助解决院系层面调解不了的问题。一方面,这种独立管理机构在课程设置方面具有更广泛、中立的视野。另一方面,便于更高效的处理通识教育各环节面临的具体事务。我国高校可借鉴哈佛大学这种模式,成立通识教育独立行政机构,例如“通识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确保通识教育各个环节工作的顺利开展。

总而言之,我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之路应当既站在国外著名高校长期探索经验的“巨人肩膀”之上,立足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进行分析和借鉴,了解其所作所为的背景、原因和益处,深入学习这些经验中的理念、方法和具体措施,以充分实现“取其精华”;同时,又要注意避免“拿来主义”,照搬照抄了一些完全不适用于当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形的做法,牢牢把握培育“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根本出发点^[5],立足于培养能否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具有创新精神的现代人的目标,制定出“全面、系统、合理”的通识教育制度化体系,才能打造出真正属于中国的通识教育模式。

参考文献

- [1] 张亮.我国通识教育改革的成就、困境与出路[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6):80-84.
- [2]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2).
- [3] 杨九斌.通识教育在美国:近一个世纪来的成就与危机[J].复旦教育论坛,2012(4).
-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J].人民教育,1999(7).
- [5] 孙乐强.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对哲学通识教育的引导作用?[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3(4):158-160.

[责任编辑:阳玉平]